

# 族群冲突背景下外国军事干涉的成因分析

杨 迪 漆海霞

**【内容提要】** 同样是面对陷入族群冲突的国外同族,为什么一些国家会选择对其进行军事干涉,另一些国家则不会呢?笔者认为,两国仅仅是存在族群联系,或者是对国外同族的认同,不能保证军事干涉一定会发生。更重要的是,本国族群对国外同族的认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实际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据此,笔者提出假设: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的权力地位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对外军事干涉是否出现的概率。具体而言,如果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的干涉国是掌握政权的支配族群,即具有占优势的权力和地位,那么其对国外同族的认同就更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其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会提升。为了验证假设,笔者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对1946—2007年间的相关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取南联盟对波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三个军事干涉案例进行分析。结合统计分析 with 案例分析的结果,笔者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关键词】** 族群冲突 支配族群 族群认同 军事干涉

**【作者简介】** 杨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ubvtgj@163.com

漆海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电子信箱:oceanqi@126.com

2 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该国的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之间的矛盾是这场危机的根源之一。因此,在危机的进程中始终可见俄罗斯的身影,先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sup>①</sup>继而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

<sup>①</sup> 张晓东等:《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联邦》,《人民日报》2014年3月19日,第21版。

帮助乌克兰东部的民间武装与政府军作战。<sup>①</sup>事实上,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都是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地区,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不乏有保护其国外同族的意图。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不禁让人联想起历史上一些相似的事件。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自独立之日起就饱受族群对立之苦。1963年底,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分别支持岛上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1974年7月,塞浦路斯发生政变,土耳其以保护岛上的土耳其族为由出兵,同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武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东欧,1992年12月,摩尔多瓦的俄罗斯族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驻扎在摩尔多瓦的俄罗斯第14集团军以保护该国的俄罗斯族人为由介入了这场冲突。这些事件的相同点是,一个国家为了支持或者保护自己的国外同族,会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

然而,在相似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出兵干涉。当南联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时,阿尔巴尼亚政府并没有出动军队帮助其在科索沃的同族。同样是面对陷入冲突的国外同族,为什么一些国家采取了军事干涉行动,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呢?这正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 一、文献回顾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分别从安全、实力、政治制度、族群联系等角度回答了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

### (一) 安全因素的影响

斯蒂芬·M. 塞德曼(Stephen M. Saideman)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有可能是为了减轻别国对自身的安全威胁。<sup>②</sup>

---

<sup>①</sup> 《乌克兰东部武装坦承:有三四千名俄罗斯志愿军协助》,中新社阿斯塔纳2014年8月28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9/c\\_12693142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9/c_126931429.htm)。

<sup>②</sup> Stephen M. Saideman, "Discri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alyz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Ethnic Group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1, 2002, pp. 27-50.

马丁·奥斯特沃·诺姆(Martin Austvoll Nome)则认为,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目的,在于抑制干涉国内的分离主义。<sup>①</sup> 两人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军事干涉的动机在于减轻干涉国所承受的安全压力,只不过前一种观点认为减轻的是外部安全压力,而后一种观点认为减轻的是内部安全压力。

## (二) 实力因素的影响

皮特·范豪登(Pieter van Houten)通过博弈论的推导发现,如果潜在的干涉国被对手认为是实力强大但又没有强烈干涉意愿的国家,那么军事干涉就不会发生。<sup>②</sup> 艾达·惠布勒格茨(Ada Huibregtse)将分析的角度转向受援方(正在经历冲突的国外同族)的实力对军事干涉的影响。他认为,如果国外同族的实力较强,那么对潜在的干涉国而言,进行军事干涉就是值得的,如此一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sup>③</sup>

## (三) 政治制度的影响

戴维·卡门特(David Carment)和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根据政治制度的差异将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制度约束力低的威权主义国家,另一类是制度约束力高的民主国家。前者的领导人在对外决策时,很少甚至不会受到掣肘,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本族群的利益,可能会寻求攻击性的对外政策,因此,别国的族群冲突诱发该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的领导人直接对人民负责,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来奖励或者惩罚领导人的行为,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有可能将本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这将使领导人承担巨大的代价,因此,制度约束力高的国

---

① Martin Austvoll Nome, "Transnational Ethnic Ties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Taking Sides in Civil Conflicts in Europe, Asia and North Africa, 1944—99,"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4, 2013, pp. 747-771.

② Pieter van Houten, "The Role of a Minority's Reference State in Ethnic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9, No. 1, 1998, pp. 110-146.

③ Ada Huibregtse, "Interstate Conflict and Ethnicity," *Civil Wars*, Vol. 13, No. 1, 2011, pp. 40-60.

家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较小。<sup>①</sup>

#### (四) 族群联系与军事干涉的关系

戴维·R. 戴维斯(David R. Davis)、威尔·H. 摩尔(Will H. Moore)以及道格拉斯·伍德维尔(Douglas Woodwell)认为,共同的族群身份会提升一国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sup>②</sup> 在现实世界中,同一族群的成员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国籍,但共同的族群身份却将所有的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某个国家的某一族群陷入冲突之中时,他们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同族自然而然地想要伸出援助之手,在这种因素的作用之下,共同族所在的国家就会做出军事干涉的决策。

在上述研究中,位于不同国家却具有共同的族群身份被认为是导致军事干涉发生的重要因素,而且能够自动生成军事干涉。这样的解释其因果链条不明晰,缺乏说服力。与戴维斯、摩尔以及伍德维尔的观点相反,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和尼尔·J. 梅尔文(Neil J. Melvin)认为,关注国外同族命运的国家并不会自动成为干涉者,共同的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导致军事干涉。<sup>③</sup>

另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导致一国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真正原因,是对其共同的族群身份的认同,即对他们国外同族的认同。斯蒂芬·M. 塞德曼(Stephen M. Saideman)、V. P. 加尼翁(V. P. Gagnon Jr.)、戴维·卡门特(David Carment)、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等学者就族群认同的形成机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塞德曼认为,对

---

<sup>①</sup> 参见 David Carment and Patrick James, "Third Party States in Ethnic Conflict," in Steven E. Lobell and Philip Mauceri, eds.,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1-34.

<sup>②</sup> 参见 David R. Davis and Will H. Moore, "Ethnicity Matters: Transnational Ethnic Alliances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71-184. Douglas Woodwell, "Unwelcome Neighbors: Shared Ethni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 1, 2004, pp. 197-223.

<sup>③</sup> Charles King and Neil J. Melvin, "Diaspora Politics: Ethnic Linkage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in Eur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1999/2000, pp. 108-138.

国外同族的认同是在民众层面自发产生的,并且能够塑造民众在本国对外政策中的偏好。当国外同族陷入激烈的武装冲突之时,民众对国外同族的命运感同身受,往往会要求国家出面干涉,该国领导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便会响应民众的要求,做出军事干涉的决定。<sup>①</sup>加尼翁、卡门特和詹姆斯则认为,对国外同族的认同是被国家领导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为了实现特定的内外政策目标,刻意在民众中间制造出对国外同族的强烈认同与密切关注,从而给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决策赋予了合法性。<sup>②</sup>虽然对国外同族的认同有两种不同的形成路径,但是一旦形成,便会对本国的军事干涉产生重要的影响。

至此,从族群联系的角度来看,对国外同族的认同对军事干涉存在影响。但实际上,对国外同族的强烈认同,直接产生的是本国的军事干涉意愿,未必会转化成为实际行动。在现实世界中,在对国外同群的认同都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有的国家则不会?因此,我们还有必要研究在某些国家里对国外同族的认同是怎样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干涉行动的。

### (五) 既有研究的不足

既有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但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用减轻安全压力来解释一国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动机,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因为军事干涉不仅难以解决别国的族群冲突,反而还有可能引发本国内部更强烈的分离主义运动,给干涉国带来更大的安全压力。而着眼于实力因素的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被干涉国对干涉国实力

---

<sup>①</sup> Stephen M. Saideman,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ecessionist Conflicts: Vulnerability Versus Ethnic 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721-753.

<sup>②</sup> V. P. Gagnon Jr.,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130-166. David Carment and Patrick James, "Internal Constraints and Interstate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Crisis-Based Assessment of Irredentis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9, No. 1, 1995, pp. 82-109.

的感知可能没有真实地反映干涉国的行为和意图。此外,从安全、实力、政治制度等角度所做的分析并没有体现出族群冲突的特性,在研究对其他类型的冲突进行军事干涉时,我们同样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

学者们针对两国的族群联系所做的研究,揭示出了影响军事干涉的族群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外国同族的认同会转变为实际的军事干涉行动呢?

## 二、本文的研究假设与变量

通过回顾已有的研究,我们看到,共同的族群身份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对别的国家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下面笔者将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 (一) 研究假设

学者们发现,建立在共同的族群身份基础上的认同,对一个国家是否会对另外一个发生族群冲突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即使一个国家对其国外同族具有强烈的认同,也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实际上,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冲突一方的外国同族只是其国家人口中的一部分,他们对外国陷入冲突中的同族抱有同情,充满认同,并不代表其整个国家都对这些族群抱有同样的感情,因此不能保证该国一定会对国外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换言之,一部分国民的感情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为国家层面的实际行动。对别国的内部事务的干涉,尤其是开展跨国界的军事干涉行动,通常是一项重大的对外决策。因此,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国家对外国冲突一方的族群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成为该国的实际对外政策。

笔者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对外国陷入冲突中的族群的认同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成为该国的实际对外政策,那么其对外国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大。如何衡量该国的族群认同转化为其实际对外政策的程度呢?这就需要考察该国的这些族群在国内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地位,也就是要考察这些族群是否掌握国家的权力。

这些族群有可能支配甚至垄断了国家的权力,例如俄罗斯的俄罗斯族、

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族、土耳其的土耳其族,都掌握着国家政权,在国家各类机构中担任要职,手中握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如果这些国家的族群同族处于这种占优势的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能够更为直接地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贯彻到决策的过程中去,通过实施特定的对外政策来实现本族群的政治目的,这样对别国族群冲突的军事干涉就容易出现。

相反的一种情况则是,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仅仅分享了一小部分国家权力,甚至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例如俄罗斯的奥塞梯族、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族、土耳其的库尔德族,它们要么在国家机构中担任少部分不太重要的职位,要么被完全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只有少许或者完全没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总而言之,它们都不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族群,对国家的外交决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它们即便对外国冲突一方族群感同身受,想要施以援手,也很难直接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变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该国对外国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较小。

## (二) 建立样本

笔者从“武装冲突数据集”(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 Version 4-2014a)<sup>①</sup>里筛选出所有国内族群冲突的记录。所谓“国内族群冲突”,必须是一国内部的冲突,并且冲突的一方为该国政府,另一方为该国内部代表某一族群的武装组织或军事人员。针对每一次族群冲突,笔者通过“处于危险中的少数民族数据集”(Minorities at Risk dataset)<sup>②</sup>以及“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 2014)<sup>③</sup>查找潜在干涉国,于是发现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生活的国家,便是潜在干涉国。

---

① Nils Petter Gleditsch et al.,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5, 2002, pp. 615-637. Lotta Themnér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13,”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4, 2014, pp. 541-554.

②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Minorities at Risk Dataset* (College Park, M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2009), [http://www.cidcm.umd.edu/mar/mar\\_data.asp](http://www.cidcm.umd.edu/mar/mar_data.asp), 登录时间: 2015年1月21日。

③ Manuel Vogt et al., “Integrating Data on Ethnicity, Geography, and Conflict: The 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 Famil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7, 2015, pp. 1327-1342.

### (三)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军事干涉,准确地说是当冲突国发生族群冲突时,潜在干涉国是否会对其进行军事干涉。本文所称的“军事干涉”是指潜在干涉国出动军事人员直接参与到冲突国的族群冲突中,并且帮助冲突一方族群与冲突国政府进行战斗。

笔者根据“武装冲突数据集”的记录来判断潜在干涉国是否对别国的族群冲突进行了军事干涉。如果进行了军事干涉,因变量的赋值为1;如果没有进行军事干涉,因变量的赋值为0。

戴维·R.戴维斯和威尔·H.摩尔使用的因变量是两国的冲突程度,这是一个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说明冲突程度越强。这个因变量实际上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事件的加权平均数,权重的赋予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可能会对最后的结果造成偏差。而且即使我们承认数据是客观的,仍然有问题,因为除了军事干涉,其他类型的事件也可能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本文关注的只是军事干涉。道格拉斯·伍德维尔使用的因变量是军事化国际争端(militarized international disputes),这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军事化国际争端,赋值为1,否则为0。虽然军事化国际争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其范围仍然大于军事干涉,即使是公开的军事,威胁也被视作是军事化国际争端。<sup>①</sup>与之相比,笔者将因变量严格限定为军事干涉,能够更明确地回答本文研究的问题。

### (四) 自变量

本文选取的自变量是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拥有的权力地位。在实际操作中,笔者考察了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是不是潜在干涉国的支配族群,并以此来衡量其在本国拥有的权力地位。

笔者根据“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的记录来自变量赋值。如果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是潜在干涉国的支配族群,赋值为1,否则为0。前文在研究假设部分已经分析过,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如果在其国内具有占优势的

---

<sup>①</sup> Douglas Woodwell, “Unwelcome Neighbors: Shared Ethni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 1, 2004, p. 205.



权力地位,便能够把对冲突一方族群的认同转化为国家的实际的对外政策,从而提升本国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因此,笔者假设当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是潜在干涉国的支配族群时,该国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更大。

戴维斯和摩尔使用的自变量是“优势跨国族群同盟”(advantaged transnational ethnic alliance)。具体而言,他们以两个国家作为观察的对象,如果有一个族群同时生活在这两个国家,并且在其中一个国家是政治或经济上处于优势的族群,而在另一个国家不是,那么就构成了所谓的“优势跨国族群同盟”。伍德维尔使用的自变量与之类似,即满足如下条件:同一个族群分别生活在这两个国家中,并且他们在其中一个国家是多数族群,而在另一个国家是少数族群。他们的自变量关注的都是两个国家的情况,没有区分干涉国和被干涉国,也没有体现出干涉的方向性。鉴于本文真正想要研究的其实是干涉国的行为,因此笔者使用的自变量限定为潜在干涉国的情况,这样就能够更加清晰地体现族群的权力地位对潜在干涉国对外决策的影响。

笔者以某一族群是否能支配国家政权来判断其权力地位。如果像伍德维尔那样仅考虑族群人口的多寡,就会难以解释人口较少的族群掌握国家权力的特例。戴维斯和摩尔所说的“优势”又包含了经济上的优势,笔者认为,经济上具有优势的族群不一定在国家的对外决策中具有主导作用,例如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即如此。综上,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在潜在干涉国的权力地位是一个更好的自变量。

## (五) 控制变量

### 1. 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

如果潜在干涉国是一个理性的国家,那么它在决定是否动用武力干涉别国的族群冲突时,必然会考虑双方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的实力对比会限制其采取军事干涉行动。戴维斯、摩尔、伍德维尔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都将干涉国与被干涉国的实力对比作为回归模型中的一个控制变量。<sup>①</sup> 鉴于

---

<sup>①</sup> Davis and Moore, "Ethnicity Matters," p. 177. Woodwell, "Unwelcome Neighbors," p. 208. Huijbregtse, "Interstate Conflict and Ethnicity," p. 51. Nome, "Transnational ethnic ties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p. 760.

实力因素不可忽视,笔者也将两国的实力对比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加以考察。

实力对比这个变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物质实力数据集”(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 version 4.0)。<sup>①</sup>笔者从其中选取出潜在干涉国和族群冲突国的国家实力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然后用前者的指数除以后者的指数,便得到了两国实力对比的数据。如果比值大于1,说明潜在干涉国的实力大于族群冲突国;如果比值小于1,说明潜在干涉国实力小于族群冲突国。

与之前的学者一样,笔者也假设实力对比与军事干涉发生的概率是同向变化的,即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之比越大,前者对后者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大。

## 2. 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接壤的情况

笔者假设军事干涉更容易在两个接壤的国家之间出现。如果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不接壤,甚至相距较远,那么前者对后者进行军事干涉将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潜在干涉国将自己的军队派遣到族群冲突国时需要借道第三国,而第三国可能会拒绝这一请求;即使潜在干涉国可以绕道第三国采取行动,但这也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因为空间距离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军事补给的迟滞。总之,不与族群冲突国接壤会增加潜在干涉国军事行动的难度和复杂性。有鉴于此,笔者预期如果两国不接壤,那么潜在干涉国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会变小。

接壤情况的数据来自“直接临近数据集”(Direct Contiguity Dataset, version 3.1),<sup>②</sup>但笔者对原数据进行了改造。原数据集里赋值为1(即陆地接壤或以河流为界的情况)的数据仍保留为1,即接壤;原数据集里赋值为不为1的数据均统一为0,即不接壤。

<sup>①</sup>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Russett ed., *Peace, War, and Numbers* (Beverly Hills: Sage, 1972), pp. 19-48.

<sup>②</sup>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Direct Contiguity Data*, 1816—2006, Version 3.1, <http://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direct-contiguity>, 访问时间:2015年3月12日。Douglas M. Stinnett et al.,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Direct Contiguity Data, Version 3,"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9, No. 2, 2002, pp. 58-66.

3. 族群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成员身份在道格拉斯·伍德维尔的研究中,两个国家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是一个控制变量,他认为这一身份能够使它们建立互信,从而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sup>①</sup>受此启发,笔者假设当冲突国发生族群冲突时,如果它与潜在干涉国共同参加了较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那么其受到后者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会变小。对于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族群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通过在相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长期而频繁的互动建立起了互信,后者可能不大愿意采用军事干涉的手段来介入前者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潜在干涉国以和平方式介入冲突国的族群冲突提供了渠道。

笔者根据“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集”(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ataset, version 2.3)的记录,统计出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sup>②</sup>假设它们共同参与的国际组织的数量越多,那么其共同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在减少军事干涉方面的作用就越明显。

### 三、统计分析

在前文提出研究假设之后,笔者将根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假设。

#### (一) 回归分析

笔者选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的方法,就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表1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

<sup>①</sup> Douglas Woodwell, “Unwelcome Neighbors: Shared Ethni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 p. 209.

<sup>②</sup> Jon C. Pevehouse, Timothy Nordstrom and Kevin Warnke, “The COW-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taset Version 2.0,”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1, 2004, pp. 101-119.

表 1 回归和检验结果

自变量、控制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P> Z	95%置信区间
同族的权力地位	2.102	0.638	3.29	0.001	(0.851, 3.352)
两国实力对比	0.029	0.01	2.91	0.004	(0.010, 0.049)
两国接壤情况	2.056	0.933	2.2	0.028	(0.227, 3.885)
两国共同的 IGO 成员身份	-0.058	0.028	-2.07	0.038	(-0.112, -0.003)
常数项	-3.988	1.219	-3.27	0.001	(-6.376, -1.599)

对数似然值 = -41.580923, 模型卡方统计量 = 27.84, Prob > chi<sup>2</sup> = 0.0000, Pseudo R<sup>2</sup> = 0.2508。

根据表 1 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把回归模型表达为如下形式:

$$\ln \frac{P(\text{军事干涉} = 1)}{P(\text{军事干涉} = 0)} = -3.988 + 2.102 \times \text{同族的权力地位} \\ + 0.029 \times \text{实力对比} + 2.056 \times \text{接壤情况} - 0.058 \\ \times \text{共同的 IGO 成员身份}$$

## (二) 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解读

### 1. 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的权力地位

自变量“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的权力地位”的回归系数是 2.102,表示的是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是国家的支配族群时,潜在干涉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发生比,是外国同族不是国家支配族群时的  $e^{2.102} = 8.179$  倍。

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的权力地位”是一个显著的自变量,如果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是国家支配族群,那么其国家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较大。可以说,统计分析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笔者的假设,即外国同族在国内具有占优势的权力地位,能够帮助他们把对冲突一方族群的认同转化为国家实际的军事干涉行动。

在本文研究的问题中,向冲突一方族群施以援助是其外国同族的利益诉求。由于他们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支配族群,因此在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中拥有主导权,能够更为直接地通过制定对外政策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便是其可以采取的一个政策选项。该国派出军队帮助冲突一方族群作战,事实上就是与族群冲突国的政府作战,而发动战争是一项重大的对外政策,需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决策程序才能最终做出决定,参与决策的人员通常包括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当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是国家支配族群时,其成员可能出任本国政府的大多数甚至全部职务,他们的利益将更容易受到重视,他们要求帮助冲突一方族群的声音更能为该国的决策者所接受,甚至决策者本人也持相同立场,因而该国决定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更大。反之,当冲突一方族群的外国同族不是国家的支配族群时,该国的决策者中就少有人或没有人属于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这样他们的呼声可能被该国的决策者所忽视,因此该国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更小。

## 2. 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

“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的回归系数是 0.029,这意味着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两国实力的比值每增加 1,潜在干涉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发生比会变为原来的  $e^{0.029} = 1.030$  倍。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的通常认识一样,潜在干涉国的实力越强,它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大。

显著性检验表明,“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会显著地影响前者对后者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潜在干涉国在决定是否出兵干涉时,必然会将自身的实力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做一番比较。如果自身实力远不如对方,那么即使该国对冲突一方族群充满认同,并且急切地想要予以援助,也不会冒着战败的危险与对方进行直接的战斗。

## 3. 族群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接壤的情况

“族群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接壤情况”的回归系数是 2.056,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两国接壤时潜在干涉国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发生比,是两国不接壤时的  $e^{2.056} = 7.816$  倍。可以据此判断,当两国接壤时,潜在干涉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更大,这与笔者的假设一致。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介于 0.01 和 0.05 之间,可以判定该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 4. 族群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冲突国与潜在干涉国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这一变量,与军事干涉发生的概率是反向变化的。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058$ ,意味着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两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每增加一个,潜在干涉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发生比会变为原来的 $e^{-0.058} = 0.944$ 倍,增加10个则变为原来的 $0.944^{10} \approx 0.56$ 倍,这实际上是缩小的变化。也就是说,两国具有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会抑制潜在干涉国对族群冲突国采取军事干涉的倾向,两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越多,潜在干涉国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越小。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表明该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 四、案例分析

在完成统计分析之后,笔者选取出三个案例进行分析,以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设。这三个案例分别是南联盟对波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以及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族群冲突进行的军事干涉。

### (一) 南联盟对波黑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

#### 1. 事件的背景与经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是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邦”)的一个共和国,境内主要生活着三大族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1991年6月,南联邦开始解体,波黑三大族群就波黑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分歧。代表穆斯林族的民主行动党和代表克罗地亚族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都主张波黑独立,但前者主张独立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后者希望波黑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代表塞尔维亚族的塞尔维亚民主党则坚决反对波黑独立。<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波黑三大族群对国家前途的分歧,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401页;熊坤新主编《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热点预警性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1992年2月29日到3月1日,波黑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多数塞尔维亚族人抵制了公投,结果99%的投票者赞成独立。<sup>①</sup>3月3日,波黑议会在塞尔维亚族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宣布波黑独立。3月5日,塞、穆两族居民发生武装冲突,造成数十人伤亡。3月26日,南联邦人民军驻波黑部队出面干预,与穆斯林族武装交火,出现伤亡。<sup>②</sup>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波黑境内的族群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演变为一场持续三年半的全面内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族获得了南联盟<sup>③</sup>的强力支持。波黑族群冲突伊始,南联盟就派出军事人员直接参与作战。有数据显示,驻波黑的8万多人的原南联邦人民军被改编为波黑塞尔维亚族地方武装。<sup>④</sup>此外,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民族卫队、志愿部队等武装也进入波黑,与塞尔维亚族一道作战。<sup>⑤</sup>

## 2. 影响南联盟进行军事干涉的因素

### (1) 控制变量对军事干涉的影响

本文的三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接壤情况”和“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首先,就实力对比而言,南联盟的实力明显强于波黑。根据“国家物质实力数据集”的记录,1992年,南联盟的实力大约是波黑的2.5倍。<sup>⑥</sup>作为实施军方干涉的一方,南联盟在实力上占据上风,这有助于它增强信心、强化干涉意愿。

其次,就两国的接壤情况而言,南联盟是当时波黑仅有的两个陆上邻国之一。南联盟与波黑接壤便于其将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迅速投入到战场上。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第402页。

② 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56页。

③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于1992年4月27日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

④ 熊坤新主编:《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热点预警性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2001年,第403页。

⑥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pp. 19-48.

作为军事干涉方的南联盟不存在供给之虞,这也助推了军事干涉的出现。

再次,就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言,南联盟和波黑作为新诞生的国家缺乏在国际组织中的互动。“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集”显示,1992年,南联盟与波黑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仅有11个<sup>①</sup>,双方还没有通过在国际组织中的频繁交流与接触建立起高度的互信,因而在波黑族群冲突发生之初,南联盟以和谈方式解决冲突的决心不大,而进行军事干涉的意愿则极为坚定。

### (2) 南联盟塞尔维亚族对波黑塞尔维亚族的认同

在南联邦解体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情绪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高涨,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塞尔维亚激进党等民族主义政党成立,它们要求解决境外的塞尔维亚族人问题,主张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sup>②</sup>为了应对这些民族主义政党的挑战,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也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措施。1991年,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就曾宣称:“所有塞尔维亚人要生活在一个共同体。”<sup>③</sup>此外,塞尔维亚社会党还通过自己控制的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不断地宣传、扩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受此影响,该国的塞尔维亚族人对境外同族的认同感持续上升。<sup>④</sup>

1992年2月,塞尔维亚的反对派征集了数十万签名,要求米洛舍维奇下台,并召开制宪会议。<sup>⑤</sup>政府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挑战,米洛舍维

<sup>①</sup> Jon C. Pevehouse, Timothy Nordstrom and Kevin Warnke, “The COW-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taset Version 2.0,” pp. 101-119.

<sup>②</sup> “塞尔维亚复兴运动”(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成立于1990年,塞尔维亚激进党(Serbian Radical Party)成立于1991年2月,两个政党拥有共同的核心纲领,即建立“大塞尔维亚”。参见 Dijana Vukomanovic,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Vladimir Goati ed., *Elections to the Federal and Republican Parliaments of Yugoslavia (Serbia and Montenegro) 1990—1996* (Berlin: Sigma, 1998), p. 36.

<sup>③</sup> 魏坤:《喋血巴尔干:南联邦解体与波黑冲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sup>④</sup> Carole Rogel, *The Breakup of Yugoslavia and the War in Bosni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8), p. 51.

<sup>⑤</sup> Milan Milosevic, “Dogadjanje potpisa,” *Vreme*, February 17, 1992, pp. 9-14, quote from V. P. Gagnon, Jr.,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 162.



奇将民众的视线从国内转向国外,此时波黑逐渐加深的族群对立局面恰好成为其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塞尔维亚执政当局将波黑的穆斯林族描绘成塞尔维亚族的敌人,在其舆论宣传中,波黑穆斯林族寻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将对塞尔维亚族实施屠杀。<sup>①</sup>受这种舆论的影响,塞尔维亚(以及南联邦解体后组建的南联盟)国内民众对波黑穆斯林族的敌意加深,对波黑塞尔维亚族命运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社会党为了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强化了南联盟塞尔维亚族对波黑同族的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赋予了南联盟在波黑进行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由于政府当局的大力建构,在波黑尚未发生族群冲突之时,南联盟的塞尔维亚族人就已经非常关注波黑同族的命运。波黑内战爆发之后,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与穆斯林族、克罗地亚族艰苦作战,面对此情此景,南联盟的塞尔维亚族人就更加感同身受,想要对波黑的同族施以援手。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恰好为南联盟对波黑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军事干涉已处于呼之欲出的状态,不过真正付诸实施还有赖于塞尔维亚族在南联盟的优势权力地位。

### (3) 塞尔维亚族在南联盟的优势权力地位

从表2中可以看出,塞尔维亚族是整个南联盟最大的族群。1992年,南联盟的总人口为1000余万,塞尔维亚族占到了其中的62.3%;阿尔巴尼亚族是第二大族群,主要生活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南部的科索沃,占南联盟总人口的16.6%;黑山族是第三大族群,主要分布于南联盟的黑山共和国,约占南联盟总人口的5%;匈牙利族是第四大族群,聚居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伏伊伏丁那,占南联盟总人口的3.3%。此外,南联盟境内还生活着其他族群,他们人口较少,并且在南联盟内没有自己的自治实体,因此南联盟政治生活和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

---

<sup>①</sup> Ejub Stitkovac, "Kur'an po Ivo Banac," *Vreme*, April 27, 1992, p. 33, quote from V. P. Gagnon, Jr.,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162-163.

表 2 南联盟主要族群人口比例

族群	人口比例(%)
塞尔维亚族	62.3
阿尔巴尼亚族	16.6
黑山族	5.0
匈牙利族	3.3
穆斯林族	3.2
罗姆族	1.3
克罗地亚族	1.1

资料来源：Tim Judah, *The Serbs: History, Myth, and 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6。

南联邦还未解体时,塞尔维亚社会党就已经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执政党,1992年南联盟成立后,塞尔维亚社会党成为整个南联盟的执政党。在1992年5月31日举行的南联盟议会选举中,塞尔维亚社会党赢得了138个席位中的74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巩固了其执政地位。<sup>①</sup> 由于该党主要代表的是塞尔维亚族的利益,其成员也主要是塞族人,因此塞尔维亚族获得了对南联盟国家权力的绝对掌控。更重要的是,塞尔维亚族还控制了南联盟的军队。南联盟继承了南联邦人民军(JNA)绝大部分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事实上,南联邦还未解体时,塞尔维亚族就在人民军的人员构成中占据了多数。有数据显示,1990年人民军的军官中,塞尔维亚族的比例为54.3%。<sup>②</sup>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脱离南联邦独立后,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族群的官兵也相继离开人民军,这样一来,塞尔维亚族在人民军中的比例就进一步提升。待南联盟成立后,它所继承的就是一支主要由塞尔维亚族组成的军队,这对于南联盟对波黑实施军事干涉十分关键,事实也证

<sup>①</sup>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Historical Archive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 Results for Yugoslavia*, [http://www.ipu.org/parline-e/reports/arc/2355b\\_92.htm](http://www.ipu.org/parline-e/reports/arc/2355b_92.htm).

<sup>②</sup> Teodor Gersak, "Who Holds the Hands of Yugoslavian Army?" *Revija Obramba*, Vol. 23, No. 6-7, 1991, pp. 48-50, quote from Ada Hyso, *Interstate Conflict and Ethnicit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2009, p. 113.

明,这支军队成为南联盟干涉波黑族群冲突的重要力量。

黑山族是黑山共和国的最大族群,约占该共和国人口的62%,塞尔维亚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比例则为9.3%<sup>①</sup>。需要说明的是,黑山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黑山族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族的一支,另一部分黑山族人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族群。一些承认自己是黑山族人的民众,同时也将自己视作黑山的塞尔维亚族人。换言之,就族群属性而言,黑山族本就与塞尔维亚族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黑山共和国的决策层是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坚定盟友。

阿尔巴尼亚族聚居的科索沃和匈牙利族聚居的伏伊伏丁那,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两个自治省。在南联邦时期,这两个省曾一度享有与6个共和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随着“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抬头,1989年,在米洛舍维奇的推动下,塞尔维亚共和国修改宪法,取消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的许多自治权利。<sup>②</sup>这意味着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族丧失了自治的地位,在政治上从属于塞尔维亚族。在新成立的南联盟中,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族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无论是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层面,还是在整个联盟层面,这两个族群都不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

在考察了南联盟的族群构成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塞尔维亚族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已经转化为在国家权力中的优势,其南联盟的对外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宪法规定黑山族享有与塞尔维亚族同等的权力地位,不过在实践中,两族保持了政策上的一致性。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族因为被剥夺了自治权利,所以失去了在国家政治框架中与塞尔维亚族讨价还价的能力,更无法参与到南联盟的对外决策中去。塞尔维亚族在南联盟的优势权力地位毋庸置疑,因此,当波黑的塞尔维亚族陷入激烈的武装冲突之中时,南联盟的塞尔维亚族得以操纵国家机器对这场冲突进行了军事干涉。

---

<sup>①</sup> Florian Bieber ed., *Montenegro in Transition: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Statehood*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3), p. 12, quote from Ada Hyso, *Interstate Conflict and Ethnicit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2009, p. 112.

<sup>②</sup> Glenn E. Curtis ed., *Yugoslavi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pp. 205-206.

## (二)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

### 1. 事件的背景与经过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屿,岛上生活着希腊族与土耳其族,1960年,塞浦路斯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独立。独立后,塞浦路斯的希腊族认为宪法中的某些条款是不公平的,因而不愿实施,土耳其族则坚决要求落实宪法的规定。<sup>①</sup> 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分配与政府组织的建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立情绪高涨。

1963年12月21日,两名土耳其族人被一名希腊族警官枪杀,引发了两族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土耳其驻扎在塞浦路斯的1000多人的军队也加入到战斗中,站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一边同希腊族作战。<sup>②</sup> 1964年8月6日,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武装围攻国内的一个土耳其族村庄,土耳其政府要求他们停止攻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第二天,土耳其的战机轰炸了该地区的希腊族阵地。<sup>③</sup> 这是土耳其第一次对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

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并没有就此终结,此后数年两族仍齟齬不断。1974年7月,希腊驻塞浦路斯的军队与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一道发动政变,推翻了与希腊军政府政见不同的马塞浦路斯总统卡里奥斯,扶植傀儡政权上台。土耳其谴责希腊主导的政变违背了英国、希腊、土耳其于1960年签订的保证塞浦路斯独立的条约,并以保护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为由出兵塞浦路斯。到8月16日土耳其宣布停火之时,土耳其军队已经占领了塞浦路斯

---

<sup>①</sup> 塞浦路斯宪法规定:公务员的70%应为希腊族,30%应为土耳其族。196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希腊族占全国人口的77.4%,土耳其族占17.4%。希腊族认为宪法的规定有失公平,土耳其族获得的比例太大,因而要求按实际人口比例分配公务员职位。土耳其族则坚持要求按照宪法的规定分配公务员职位。此外,在创建军队以及是否在5个主要城市单独设立土耳其族市政机构等问题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详见何志龙编《塞浦路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5—97页。

<sup>②</sup> 熊坤新主编:《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热点预警性研究》,第200页。

<sup>③</sup> Andrew Borowiec, *Cyprus: A Troubled Island*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p. 64.

三分之一的领土。<sup>①</sup> 这是土耳其第二次对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

## 2. 影响土耳其进行军事干涉的因素

### (1) 控制变量对军事干涉的影响

首先,就国家的实力对比而言,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之一,而塞浦路斯仅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弹丸小国。根据“国家物质实力数据集”的记录,1963年土耳其第一次进行军事干涉时,土耳其的综合实力约为塞浦路斯的115.6倍。1974年土耳其第二次进行军事干涉时,两国实力差距有所缩小,但土耳其的实力仍然达到了塞浦路斯的59倍。<sup>②</sup> 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对土耳其来说无疑是一剂定心丸。

其次,就两国的接壤情况而言,虽然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并不是陆上邻国,但是两国隔海相望,距离仅有64千米,基本上与陆地接壤相同。<sup>③</sup> 土耳其出动军队到塞浦路斯并不需要借道第三国,也不会面临军事补给线过长的问题,这打消了土耳其进行军事干涉的后顾之忧。

最后,就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言,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发生时,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互动较少,这不利于土耳其以和平的方式介入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集”显示,1963年土耳其第一次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时,两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并不多,只有16个。<sup>④</sup> 当时两国还未通过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频繁接触与交流建立起高度的互信。1974年土耳其第二次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时,两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有所增加,达到了29个。<sup>⑤</sup> 但即便如此,两国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对和平解决冲

① 何志龙编:《塞浦路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②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pp. 19-48.

③ Eric Solsten ed., *Cyprus: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p. 14.

④ Jon C. Pevehouse, Timothy Nordstrom and Kevin Warnke, “The COW-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taset Version 2.0,” pp. 101-119.

⑤ Jon C. Pevehouse, Timothy Nordstrom, Kevin Warnke, “The COW-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taset Version 2.0,” pp. 101-119.

突所发挥的作用仍不明显。鉴于塞浦路斯的政权掌握在不被土耳其信任的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手中,土耳其更倾向于采用军事干涉的手段来保护塞浦路斯的自己的同族。

## (2) 土耳其的土耳其族对塞浦路斯同族的认同

历史上,塞浦路斯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生活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耳其族原本就是土耳其的国民。英国殖民统治塞浦路斯后,该岛上的土耳其族与土耳其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族群的同一性成为联结双方的纽带。<sup>①</sup> 土耳其新闻媒体发起的“塞浦路斯是土耳其的”运动贯穿 20 世纪 50 年代。例如在 1951 年 3 月 27 日,土耳其《人民之声》报就刊文要求将塞浦路斯并入土耳其。与此同时,在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以大学生为主的民众多次举行游行,表达他们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认同。<sup>②</sup> 受此影响,土耳其政府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关注逐渐升温。1955 年 8 月 24 日,土耳其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场演讲,表达了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关切。<sup>③</sup> 在曼德列斯担任总理期间,土耳其国内还成立了“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的领土”协会。<sup>④</sup>

上述种种,无一不体现出土耳其的土耳其族对塞浦路斯同族的认同。因此,当塞浦路斯发生激烈的族群冲突并引发土耳其族人伤亡之后,土耳其关注塞浦路斯同族的命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1963 年 12 月,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爆发后,引起了土耳其的高度关注。12 月 28 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土耳其代表呼吁联合国关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正在成为大规模种族清洗的牺牲品”。<sup>⑤</sup> 面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被希腊族围困的局势,土耳其政府表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人民负责,

① 1923 年《洛桑条约》签订以前,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仍然保留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眼中,土耳其是他们的祖国。参见 Eric Solsten ed., *Cyprus: A Country Study*, p. 215; Necati Ertekun, *The Cyprus Dispu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

② Umut Uzer, *Identity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Kemalist Influence in Cyprus and the Caucasus*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p. 117, 145.

③ Umut Uzer, *Identity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Kemalist Influence in Cyprus and the Caucasus*, p. 141.

④ 杨兆钧编:《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⑤ 何志龙:《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8页。

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安全。”<sup>①</sup>此外,土耳其总理伊斯梅特·伊纳尼向议会宣称:“土耳其将用一切手段来回应任何侵害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行为。”<sup>②</sup>

1974年7月,由希腊策划的塞浦路斯政变发生后,建立起新希腊的傀儡政权,土耳其民众群情激昂,愤怒的民众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中央街区和机场附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对此进行干涉。<sup>③</sup>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希腊参与塞浦路斯政变意在吞并塞浦路斯,此举违反了1960年英国、希腊和土耳其签订的保证条约,该条约规定土耳其有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权利的责任。<sup>④</sup>因此,土耳其要求希腊废除塞浦路斯的傀儡政权,并从塞浦路斯撤走希腊本国的官员。

在本案例中,土耳其的土耳其族对塞浦路斯同族始终充满了认同,即使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塞浦路斯的独立也没有割裂他们跨越国界的族群联系。土耳其民众通过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表达对塞浦路斯同族的关切,土耳其新闻媒体也营造出与民意一致的舆论氛围。这种源自民众层面的族群认同对土耳其政府产生了压力,当局如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对民众的呼声作出回应,因而也密切关注着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当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武装冲突骤起之时,土耳其民众群情激昂,此时土耳其政府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是顺应民意之举。不过,确保土耳其真正出兵还有赖于土耳其族在土耳其占优势的权力地位。

### (3) 土耳其族在土耳其占优势的权力地位

根据“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的记录,从1946—1974年,土耳其族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族群,占国家总人口的75%。<sup>⑤</sup>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的材料

① 何志龙:《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第221页。

② Umut Uzer, *Identity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Kemalist Influence in Cyprus and the Caucasus*, p. 128.

③ Joseph S. Joseph, *Cyprus: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7), p. 52.

④ Helen Chapin Metz ed., *Turkey: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6), p. 53.

⑤ Lars-Erik Cederman, A. Wimmer and B. Mi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pp. 87-119.

中,这一比例更大,土耳其族占国家总人口的80%~88%。<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后,土耳其族控制的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国内的族群区分,不承认境内存在少数族群。例如1924年的土耳其宪法就规定,土耳其不是一个多族群国家,除了土耳其族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族群。<sup>②</sup> 通过推行同质化的族群政策,土耳其族牢牢掌握了国家权力。

库尔德族是土耳其最大的少数族群,由于国家的人口普查没有将库尔德族算作单独的一个族群,因此没有关于土耳其库尔德族人口数量的官方数据。根据“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的记录,库尔德族占土耳其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18%。<sup>③</sup> 按照当前的国际政治理念,接近总人口五分之一的规模足以使库尔德族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利。然而长期以来,库尔德族独立的族群身份不被土耳其政府承认,并且受到政府的系统性歧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土耳其政府为了掩盖库尔德族的存在,将其视为“山地土耳其族”。<sup>④</sup> 而在本案例涉及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库尔德语始终为土耳其法律所禁止,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学校都严禁使用。库尔德族知识分子试图创办库尔德语的报刊杂志,但仅仅出版了几期便被政府当局以法律理由禁刊。<sup>⑤</sup>

库尔德族为了获得自己的族群身份与政治、文化权利而与土耳其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时常遭到政府的强力打击。<sup>⑥</sup> 在这种背景下,库尔德

① Helen Chapin Metz ed., *Turkey: A Country Study*, p. 96.

② Mesut Yegen, “‘Prospective-Turks’ or ‘Pseudo-Citizens’: Kurds in Turke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3, No. 4, 2009, p. 599. 土耳其现行宪法于1982年生效,是该国第三部宪法。参见外交部网站《土耳其国家概况》,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666/](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666/)。

③ Lars-Erik Cederman, A. Wimmer and B. Mi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pp. 87-119.

④ Helen Chapin Metz ed., *Turkey: A Country Study*, p. 95.

⑤ Helen Chapin Metz ed., *Turkey: A Country Study*, pp. 98-100.

⑥ 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至今,库尔德族与土耳其政府的斗争不断。1924—1938年,土耳其库尔德族进行了16次起义,影响较大的有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起义、1927—1932年的亚拉腊山起义、1936—1939年的德西姆起义。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进行政治暗杀和破坏活动。1984年起,库尔德工人党开始了长期的武装游击战争,至今仍然威胁着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统一。针对库尔德族的武装斗争,土耳其政府也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打击政策。详见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116页。



族无法接触到土耳其的国家权力,更无法在对外决策中对土耳其族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

除库尔德族外,土耳其国内还有诸如希腊族、亚美尼亚族、保加利亚族、格鲁吉亚族等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这些少数民族群的人口规模很小,加起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sup>①</sup>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少数民族群的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自由也受到限制。它们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因此,他们的存在并不会给土耳其政府的对外决策造成干扰或形成阻碍。

在考察了土耳其的族群构成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的土耳其族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已转化为在国家权力中的优势,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在对外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当塞浦路斯的族群冲突发生之后,土耳其政府能够迅速地做出军事干涉的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身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极大关切。

### (三) 亚美尼亚干涉阿塞拜疆的族群冲突

#### 1. 事件的背景与经过

苏联时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下简称“纳卡”)是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虽然亚美尼亚族是纳卡自治州最大的族群,但该地区并不与亚美尼亚接壤。历史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纳卡的归属持有争议,纳卡自治州的亚美尼亚族回归亚美尼亚的愿望十分迫切<sup>②</sup>。1988年2月20日,在阿塞拜疆族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纳卡自治州苏维埃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将纳卡划归亚美尼亚管辖。<sup>③</sup> 阿塞拜疆对此予以回击,封锁了连接

---

<sup>①</sup> 李艳枝:《试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世界民族》2014年第5期,第83页。

<sup>②</sup> 早在1963年,就有大约2500名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向苏联中央政府请愿,呼吁将纳卡划归亚美尼亚。参见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4.

<sup>③</sup>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p. 158.

纳卡与亚美尼亚的陆上走廊。<sup>①</sup>

从1988年2月至1991年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民兵组织与阿塞拜疆安全部队持续进行着低强度的武装冲突。<sup>②</sup>1991年9月2日,纳卡当局宣布成立“纳卡共和国”,并脱离阿塞拜疆独立。阿塞拜疆随即派出安全部队大举进攻纳卡的亚美尼亚族居住区。<sup>③</sup>

苏联解体后,纳卡冲突从阿塞拜疆的国内族群冲突迅速演变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亚美尼亚军队站在纳卡的亚美尼亚族武装一边,同阿塞拜疆军队作战。在战争中,亚美尼亚军队不仅占领了纳卡的绝大部分土地,甚至还占领了纳卡周围原本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领土。<sup>④</sup>1994年5月12日,两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阿塞拜疆丧失了对纳卡的控制权,纳卡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

## 2. 影响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进行军事干涉的因素

### (1) 控制变量对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进行军事干涉的影响

首先,就国家的实力对比而言,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族群冲突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案例具有特殊性,因为作为干涉方的亚美尼亚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亚美尼亚的国土面积小于阿塞拜疆,人口数量也少于阿塞拜疆,根据“国家物质实力数据集”的记录,1991年亚美尼亚的综合实力约为阿塞拜疆的54%。<sup>⑤</sup>尽管如此,亚美尼亚还是毅然决然地出兵阿塞拜疆,为了纳卡亚美尼亚族的命运而战,并且在战斗中屡屡获胜,最后占领了几乎整个纳卡,可谓“以弱胜强”。有学者指出,亚美尼亚在军事上获胜主要得益于俄罗斯

<sup>①</sup>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pp. 162-163.

<sup>②</sup>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p. 169.

<sup>③</sup> 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pp. 77-78.

<sup>④</sup> 有学者指出,亚美尼亚一共占领了阿塞拜疆13.62%的领土。参见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6.

<sup>⑤</sup>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pp. 19-48.

的相助。俄罗斯本来是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两国的战争的,然而事实上它却偏袒亚美尼亚一方,暗中为该国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sup>①</sup>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亚美尼亚实力方面的劣势。

其次,就两国的接壤情况而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是陆上接壤的邻国,不存在军事供给线过长的问题,这有利于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进行军事干涉。

再次,就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言,1991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刚刚从苏联独立出来,还未来得及加入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集”显示,1991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为0。<sup>②</sup>也就是说,当纳卡冲突爆发之时,两国还没有通过在国际场合中的频繁接触培育起互信,双方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意愿不坚定。而在双方对立情绪极其高涨的情况下,兵戎相向也就在所难免了。

#### (2) 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族对阿塞拜疆同族的认同

在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族心中,纳卡是他们的土地,纳卡的亚美尼亚族是他们的同胞,这在纳卡冲突爆发以前就有所体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发生了摩擦,亚美尼亚的一些知识分子于是向苏联中央政府请愿,要求将纳卡重新划归亚美尼亚。<sup>③</sup>20世纪80年代末期,亚美尼亚人多次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科学家、高级军官等精英和普通民众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向苏联中央政府寄去了上千封信件,希望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其中的一份请愿书上有多达8万名亚美尼亚人签名。<sup>④</sup>在接受美籍亚美尼亚裔群体

<sup>①</sup>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第187页。

<sup>②</sup> Jon C. Pevehouse, Timothy Nordstrom and Kevin Warnke, “The COW-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taset Version 2.0,” pp. 101-119.

<sup>③</sup>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5), p. 19.

<sup>④</sup> Ohannes Geukjian,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Nagorno-Karabakh and the Legacy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p. 130.

的媒体采访时,苏联原领导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之子、历史学家谢尔戈·米高扬等亚美尼亚名流公开支持纳卡回归亚美尼亚。<sup>①</sup>

1988年2月,苏联中央政府拒绝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招致亚美尼亚人的强烈抗议。在首都埃里温,市民进行示威游行,到26日,示威者人数多达150万,而当时亚美尼亚全国总人口也才300多万。<sup>②</sup>这足以表明亚美尼亚人对纳卡同族的强烈认同。此外,亚美尼亚国内一部分民众还开始做军事斗争的准备。为了保卫纳卡,一个亚美尼亚独立民兵组织甚至从兵工厂和警察局夺取武器武装自己,为可能发生的战斗做准备。<sup>③</sup>

1991年9月23日,亚美尼亚正式独立。10月,亚美尼亚“全民族运动”领导人列翁·阿科波维尔·捷尔-彼得罗相当选为独立后的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捷尔-彼得罗相曾经因为积极从事收复纳卡的运动而被苏联当局监禁过。成为开国总统之后,他继续密切关注着纳卡问题。1992年2月19日,他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如果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谈判破裂,就应该“进行国际干预”。<sup>④</sup>同年9月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捷尔-彼得罗相再次强调,纳卡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不能被否定。亚美尼亚议会也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政府在任何承认阿塞拜疆对纳卡拥有统治权的文件上签字。<sup>⑤</sup>

在本案例中,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族对纳卡的同族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认同,即使苏联时期纳卡归属阿塞拜疆的现实也未能割裂这种族群联系。亚美尼亚民众通过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纳卡同族的关切。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全民族运动”顺应民意,主张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后来获得了执政地位。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该党在纳卡问题上毫不妥协,当阿塞拜疆政府大举进攻纳卡亚美尼亚族聚

①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p. 20.

② 刘庚岑:《苏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民族抗议活动及有关事件的始末》,《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3期,第91页。

③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p. 22.

④ 施玉宇等编:《亚美尼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⑤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p. 64.

居地区后,亚美尼亚政府毅然决然采取了军事干涉的手段。不过,亚美尼亚政府能够真正出兵,还有赖于亚美尼亚族在其国内占有优势的权力地位。

### (3) 亚美尼亚族在亚美尼亚占有优势的权力地位

在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中,亚美尼亚的族群差异程度最小,该国绝大多数国民都是亚美尼亚族。198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美尼亚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3.3%。主要的少数民族有阿塞拜疆族、库尔德族、俄罗斯族,不过这些少数民族的规模都很小,其中人口最多的阿塞拜疆族所占的比例也不到3%。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希腊族和乌克兰族等族群,他们的人口加起来少于3万。<sup>①</sup>因此,可以说亚美尼亚族是亚美尼亚绝对的主体族群(见表3)。

表3 亚美尼亚主要族群人口比例

族群	人口比例(%)
亚美尼亚族	93.3
阿塞拜疆族	2.6
库尔德族	1.7
俄罗斯族	1.6

资料来源: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 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5), p. 31。

在独立后的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族稳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垄断了对外决策。亚美尼亚“全民族运动”领导人捷尔-彼得罗相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全民族运动”的创始人获得政府和议会中的高级职位。<sup>②</sup>从1991年亚美尼亚独立,到1994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签订停火协议,“全民族运动”的成员出

<sup>①</sup>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p. 31. 根据本文统计分析所引用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的记录,1991年独立之时,亚美尼亚族占亚美尼亚全国总人口的97.9%。参见 Lars-Erik Cederman, A. Wimmer and B. Mi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pp. 87-119。

<sup>②</sup>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p. 161.

任了总统和大多数部长,并且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sup>①</sup>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族在本国的军队中也占据了支配地位。苏联解体后,一批原苏联的军官开始着手创建亚美尼亚军队,他们中很多都是从苏联军队中复员的亚美尼亚族人,例如亚美尼亚的总参谋长就曾经担任过苏军副总参谋长。<sup>②</sup>由此可见,亚美尼亚族将国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得益于这种占优势的权力地位,亚美尼亚族能够操纵国家机器干涉阿塞拜疆的族群冲突,为纳卡的同族人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并与他们并肩作战。

在原苏联时期,阿塞拜疆族是亚美尼亚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以1987年10月发生在纳卡北部村庄的纠纷为导火索,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的关系逐渐恶化。随着亚美尼亚族对阿塞拜疆族的骚扰逐渐增多,后者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被迫离开亚美尼亚。<sup>③</sup>据亚美尼亚一位地方官员证实,1988年2月的一个晚上,2000多名阿塞拜疆族人离开了亚美尼亚南部的卡凡地区,前往阿塞拜疆。<sup>④</sup>11—12月的几个星期内,大约有16万阿塞拜疆族人离开亚美尼亚,他们曾经聚居的村落变得荒芜人烟。<sup>⑤</sup>到1989年,亚美尼亚境内几乎所有的阿塞拜疆族人要么被驱赶出境,要么移民国外。<sup>⑥</sup>随着他们的离去,亚美尼亚族最主要的国内竞争对手消失了。因此,当亚美尼亚族控制的政府决定出兵阿塞拜疆之时,也就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了。

在考察了亚美尼亚的族群构成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亚美尼亚族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权力中的优势,亚美尼亚族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

①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p. 6.

②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p. 163.

③ 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p. 65.

④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p. 19.

⑤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p. 164.

⑥ Glenn E. Curtis ed.,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Country Studies*, p. 32.

在对外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被迫离开,而其他少数民族因为规模非常小,对亚美尼亚对外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当阿塞拜疆政府对纳卡的亚美尼亚族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亚美尼亚政府能够做出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纳卡同族的极大关切。

#### (四) 三个案例的比较

比较这三个案例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干涉国都是支配族群。具体而言,在波黑,塞尔维亚族与穆斯林族、克罗地亚族发生了武装冲突,而塞尔维亚族在南联盟是支配族群;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与希腊族发生了武装冲突,而土耳其族在土耳其是支配族群;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发生了武装冲突,而亚美尼亚族在亚美尼亚是支配族群。

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方面,作为干涉国的南联盟和土耳其,其综合实力都分别强于被干涉的波黑和塞浦路斯。南联盟的实力约是波黑的2.5倍;土耳其的实力更是远远强于塞浦路斯,它在两次干涉时的实力分别约为后者的115.6倍和59倍。这样的局面显然对干涉国有利。三个案例中只有亚美尼亚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干涉的一方,它的综合实力大约只有被干涉的阿塞拜疆的一半。尽管如此,紧密的族群联系,以及对国外同族的强烈认同,超越了亚美尼亚在实力对比上的劣势,对其军事干涉的形成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同时,亚美尼亚族在本国的支配地位,将其对阿塞拜疆同族的认同转化为贯彻始终的军事干涉行动。

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接壤情况方面,南联盟与波黑、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均为陆上邻国,这便利了干涉国的军事行动。土耳其虽然不与塞浦路斯陆地接壤,但两国仅相隔一条64千米宽的海峡,这并不会给土耳其的军事干涉行动造成太大的困难,因此该案例基本上可以视作两国接壤。

此外,在三个案例中,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都比较少。1992年,南联盟与波黑共同参加了1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1963年,土耳其第一次干涉塞浦路斯时,两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为16个,10年后土耳其第二次干涉时,这一数字有所增加,达到了29个。

1991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刚刚独立,还没有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体而言,族群冲突发生时,这三对国家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偏少,这意味着它们还没有通过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频繁接触建立起高度的互信,同时也缺乏和平调解争端的渠道。

纵观三个案例,在“实力对比”“接壤情况”和“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三个控制变量大致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干涉国占有优势的权力地位,最终都促成了干涉国对冲突国族群冲突的军事干涉(见表4)。

表4 三个案例的比较

案例名称	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是否支配族群	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实力对比	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是否接壤	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共同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
南联盟干涉波黑族群冲突	是	2.5	是	11
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族群冲突	是	115.6(第1次) 59(第2次)	否(可视为接壤)	16(第1次) 29(第2次)
亚美尼亚干涉阿塞拜疆族群冲突	是	0.54	是	0

## 五、结 论

国际关系学界不乏对族群冲突背景之下外国军事干涉的研究。之前的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族群联系而产生的跨国族群认同,能够促成一国对国外同族卷入的冲突进行军事干涉。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因为对陷入冲突的国外同族的严重关切,能够产生相关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的意愿。

但是,它们军事干涉的意愿能否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核心论点便是,在军事干涉的意愿转变为实际行动的过程



中,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的权力地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支配族群,在对外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会受到国内其他族群的掣肘,因而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与意愿上升到整个国家层面,从而将军事干涉付诸实践。简言之,一国的支配族群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把对国外同族的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对族群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提升了,这就是族群的权力地位影响军事干涉的逻辑。

笔者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对1946—2007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潜在干涉国与族群冲突国的实力对比、接壤情况以及共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三个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的权力地位,对军事干涉的出现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统计分析之后,笔者选取了三个案例进行分析,分别是南联盟对波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族群冲突分别进行军事干涉。三个案例中,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干涉国都是支配族群,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军事干涉。结合统计分析 with 案例分析的结果,笔者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事实上,在所有的族群冲突中,真正引发了外国军事干涉的案例并不是多数。而且在那些没有出现外国军事干涉的案例中,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在潜在干涉国同样可能是支配族群。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军事干涉,也许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笔者对案例的选取设定了严格的标准,本文所研究的军事干涉,是对外国族群冲突的干涉,而对外国其他类型冲突的干涉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例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国内冲突的干涉就不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内容,因为它们不是族群冲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所有案例中的潜在干涉国,都必须是冲突一方族群的同族世代生活的国家。如果将这些限制条件去掉,不能保证本文的理论仍然成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以后的研究可以将潜在干涉国扩大为所有的国家,从而得到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